

西藏文史資料選輯 24

牀初題



西藏自治区政协法制民族宗教文史委员会编

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24/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8. 3

ISBN 978 - 7 - 105 - 09160 - 7

I. 西… II. 西… III. 文史资料—西藏 IV. K29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9896 号

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24

- 编 著**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
责任编辑 张义军
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
网 址 www.mzcbbs.com
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
邮政编码 100013
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版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印 数 1 ~ 2000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
印 张 10.5
字 数 220 千字
书 号 ISBN 978 - 7 - 105 - 09160 - 1/K · 967(汉 570)
定 价 18.60 元
-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

(投稿热线:010-64275311;发行部电话:010-64211734)

目 录

向昨天告别	柳陞祺	/ 1
贵族帕莫拉定 家族简史	拉定·朗杰多吉 格龙·洛桑丹增	/ 14
清末以来西康地区的 帝国主义各教会	格桑群觉	/ 23
1959年前拉萨的私塾教育	索 穷	/ 33
甘孜事变回忆	樊叔翔 杨斐成	/ 43
抗日战争时期的西藏风云	策仁旺杰· 萧崇一	/ 77
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考	陈 炳	/ 92
我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进藏 工作的经历	谭 熹	/ 99

原国民党军统驻拉萨站 电台支台书记常希武	常希武 口述 张宗显 整理	/ 112
西藏夏格巴代表团秘密访美	陈强立	/ 131
刘文辉退守西康 退避“中央”	张怀献 吴剑洲	/ 136
墨脱工作日记摘抄	冀文正	/ 167
1957年自己搞“改革” 的格桑西绕	徐洪森	/ 189
1958年七八月张经武 同噶伦们的几次谈话简录	徐洪森	/ 196
在阿里军营里	郝广福	/ 208
类乌齐县 20 世纪 50 年代 大事摘要	邓大弼	/ 228
我经手的几件书信和 调查报告	邓大弼	/ 260
上密院和下密院	高贺福	/ 277

1942 年美国政府关于
西藏问题的文件 沈元加 / 286

关于周仁山同志生平事迹的
一些回忆 黄静波 / 303
(蒙古族)

向昨天告别

——记 1949 年我离开西藏的经过

柳陞祺

我于 1944 年进藏，1949 年秋离藏，在拉萨住了整整 5 年。离开西藏时正发生西藏地方政府遣送国民政府人员出境的所谓“驱汉事件”，常常有人问我这次事件发生的经过，使我很为难。因为事实上当拉萨发生这一事件时，我已辞职到了亚东边境，在正准备经锡金去印度的途中。我是到了锡金首都甘托克才听到这消息的，事前可说是一无所知。

这当然会引起下一个问题，我又为什么在那时候辞职去印度的呢？这里涉及个人的琐事，本来不值一提，但现在回忆这段经历，也觉得有几处可从侧面反映当时拉萨同国民政府的关系，所以还是决定在这里写出来，以供参考。

我住拉萨 5 年，一直担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英文秘书一职，凡与我职务无关的事情，很少过问。但仅以我见闻所及，也可以看出办事处同西藏地方当局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分成两个阶段。

大致从 1944 年我们跟沈宗濂入藏算起，到 1946 年

初他离拉萨去南京述职为止，是一个阶段，这是我们走顺风路的日子。从这以后，我们就慢慢走上逆风路，直到离开。这倒不是把沈宗濂一人的去留看得太重，而是需要同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结合起来，才能看得比较清楚。

1944 年中美英三国举行开罗会议之后，中国的国际地位一下被抬到世界四强之一。同时，印度的独立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。1942 年初，蒋介石访问印度，他在加尔各答会晤了被尊为圣雄的甘地，发表了一篇支持印度独立的讲话。这在几乎与世隔绝、但一贯把整个世界看成只有一个“英吉利”的拉萨上层人士中，激起了一层小小的波澜。到 1945 年，我们又赢得了 8 年抗战的伟大胜利，日本投降，这一切无疑为我国解决所谓“西藏问题”创造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有利的国际条件。

沈宗濂刚到拉萨时，似乎也很想有一番作为，他大概给重庆国民政府上过一份意见书，其中一点是如果中央权力不能直接到达西藏，那么一切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，只能是徒劳。这里他可能暗示了应当先对青海、四川、云南三省的地方军阀势力施加适当的压力，才是解决“西藏问题”的前提。但是重庆方面马上复电，告诫他到任之初，务必慎重，万万不可草率从事。其中有一份戴季陶给他的私电，有两句话留给我的印象最深，内容是劝他“以无事为大事”、“以无功为大功”。他接到这个电报就让我们看了。我猜，一方面他是表示要挽回西藏局势，决不是他一人微薄的力量所能胜任的，另一方面也是借此向我们透风，让大家不要过急，以免惹出

麻烦。

因此，沈宗濂在拉萨一年多，仅忙于各方的酬应往来，联络感情。拉萨官场，本来就重视这一套。以那时的宴会标准，起码是一天（当然名为一天，实际是半天），而且要按照西藏官阶级别、机关大小、分批分期地轮流举办。我们是新到的，理应去拜会送礼，而后是对方接风回礼。无论对方请我们，还是我们请他们，都要分等级、按机关一一照办，这样往返循环，往往一连就是十天半月。再加上西藏地方节日之多和个人喜庆之繁，那就更忙。真个是朝朝宴饮，暮暮笙歌，一派升平气象，这不但在当时抗日战争、烽火连天的祖国内地少有，就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世界其他地方来说，怕也是未必多见的了。

尽管沈宗濂是这样忙忙碌碌，应酬往来，似乎没有多少其他事情，可是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，在1946年初，他去内地述职的时候，却悄悄地把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个哥哥（俗人）嘉乐顿珠带走了，这在拉萨成了一大新闻。

如果我记得不错，嘉乐顿珠那时约十四五岁，按照清代旧制，如果他是达赖的父亲或在俗（即未出家为僧）的长男，他是可以封公爵的。不过当时的达赖父亲尚在，而且民国也没有这种封爵制了，但大家还尊称达赖父亲为佛公，多少有沿袭这一旧称的意思。当然封了公爵，也只是一个虚衔，并不意味着掌握实权，不过他的名份地位就应排在包括噶伦在内的一切西藏僧俗官员之上。

等到达赖成年，正式“管事”（这是清代官书上用的术语），那么这个“公”的地位和影响就可能在西藏起到很大作用。这是当时人一致的看法。

然而结合当时西藏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。大家知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家都来自西宁附近，他们到拉萨不过5年，而且达赖本人年幼，离成年还远，家人还没有在拉萨扎下根来。虽然西藏地方政府照例拨给他们不少庄园，据说有上万名的农奴，并住在拉萨布达拉宫东面一个很气派的院落内，然而在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内部，这佛公一家还不起什么作用。我除了在正式典礼中看到佛公照例排在四名噶伦的前面之外，就以上面提到同驻藏办事处那么多的往来应酬言，尽管拉萨上层贵族也有派系之分、亲疏之别，我在这家碰不到的人，在别家总会碰到，唯独佛公一家是在我们同拉萨贵族的公私宴会或一般访问中，是从未碰到过的。反之，我几次去参加佛公的宴会或到他家访问时，也从未见过哪家贵族，特别是有声望的贵族在场，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疏远的。至于佛公本人，还是满口的青海方言，尽管他在西藏地方拥有这么多的庄园、这么多的农奴，衣食享用都比他过去好了不知多少倍，但是他还念念不忘他的老家西宁。这对当时拉萨的某些贵族来说，好像有点格格不入。这可能也是达赖家属同当时拉萨贵族之间往来不多的一个理由。

无论如何，沈宗濂这次突然把嘉乐顿珠带往内地，这在拉萨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响。据我所知，事情不但

出乎当时拉萨当局的意料，也出乎在一旁小心注视着西藏一切动静的英代表的意料，甚至出乎我们驻藏办事处人员的意料。事后，我就问过继沈宗濂任办事处处长的陈锡璋，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。办事处内就有人提出问题，像这样做法，到底是否明智？更有人还含蓄地说，以后的事情是否会不好办了？

以我观察到的情况来看，办事处同拉萨地方政府的关系，虽没有从此变坏，但至少也不像前一阶段那样热乎了。

当然原因决不只是这一个。抗战胜利后，大家盼望能过一段太平日子，想不到又落空了。蒋介石急于要打内战，结果是越打越大，越打越没法收拾，终于逃往台湾，这是最根本的原因。可是对沈宗濂来说，他似乎从此可以销差，留在内地，再也不回西藏，像我们开玩笑时说的，他在当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驻京处处长了。

大凡旧中国的官场有个风气，一个主管来了，带一批人，到下一个主管来了，又另带一批人，这叫做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。依当时情况而言，既然沈宗濂再回西藏已不可能，那么像我们这样跟他一起进藏的人，自然要考虑到自己的进退问题了。我们大多同蒙藏委员会没关系，而且也都无意在西藏久留。时间一年年过去，也有些同事陆续内返了，留下来的多少是因为后续无人。何况在一段时期内，沈宗濂还兼有蒙藏委员会委员和驻藏办事处处长的名义，所以大家也有点观望。就我个人而言，那时还比较年轻，慢慢地对藏族的历史、文化、社

会风俗等方面产生了研究的兴趣，我想拉萨正是一个最理想的学校，我既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，就索性静下心来看看书，学习学习，也无不可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一住又住了几乎3年之久。

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终于辞职，而一走了之呢？回忆起来，有下面几件事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。

1947年发生了热振事件。在事件发生之初，我并没有给予重视。热振呼图克图我只见过一面，那是1945年他来拉萨时我们跟沈宗濂去拜会过他，并在他那里吃了一顿饭，对他过去的事迹，我亦不甚了解。当时拉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新闻媒介的地方，谣言就特别多。事变前的几天，拉萨已有各种不利于热振的流言。我想，热振住在热振寺，离拉萨有两三天的马程，如果谁对热振有什么不利的意图，像这样预先广为传播，还能起到什么作用？但到后来事变果真发生，而且有些情节同外间谣传的大致一样，这才使我慢慢重视起来。因为身在拉萨，日有所闻，而且事件还不断有新的发展，于是就决定把每天的见闻记录下来。记时虽只是片言只语，但逐日积累，到事件告一段落，也积累了不少现成材料，足够写一篇专题报道了。

这样，我就在住所写出一篇事变经过，主要是把自己看到的和在拉萨可说已是路人皆知的情况，汇总贯串，既没有外出私行采访，也没有看到一页办事处的内部材料，但是这中间也难免有一些表达我个人思想和感情的词句。我认为我写的无非是些街头巷尾之谈，毫无机密

可言，我既写了当然由我个人负责。写完后，恰巧有人回内地去，我就署了一个笔名，托他带给当时已改任上海市秘书长的沈宗濂，请他处理。

这样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几乎把这事情忘掉了。一天，我去所里同陈锡璋谈话，他告诉我，几天前噶厦曾派一名汉文秘书来见他说，有人在内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热振事件的文章，噶厦极为重视。这位秘书说，他们敢于断言，写这篇文章的人绝不出基度巴这个房子（基度巴是当时驻藏办事处所在地的房名，拉萨习惯用房名来称其户主），只是还不能确定究竟是谁。他说，陈处长如能把名字告诉他的话，他答应一定不说出去，并且还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，以加重语气。陈在讲完这段经过之后对我说，他实在猜不透这人究竟是谁，不过根据编者按语中说作者曾在拉萨住过几年这句来推测，是否是我所刚回内地去的什么人写的。大约在这事发生前的不久，蒙藏委员会曾有一个电报给办事处，说以后凡有人从拉萨返回内地时，请务必注意不要沿途对外随便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个人意见，这使我觉得有说明事实的必要了。我问他，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。他说，开头部分作者说是一天他同友人在拉萨河边一起散步，突然有人来报告，说是拉萨市内戒严，发生了事变等等。我当即告诉他，这文章是我写的。他听了大为惊讶，连说真没有想到。但他没有再说下去，我也就再没有问下文。

从这噶厦处来人的语气，不难听出他们对这篇文章

感到有点恼火，然而以他们惯有的礼貌和办事的谨慎，先派人来通个信息，说明他们大体已猜到这人是谁，至少是把大范围已经摸准了。他们非常巧妙地用一名普通秘书的口吻说，只要让他知道了，他保证不说出去。这是一句不太正常的话，既可以说是警告，也可以说是恫吓。这里包含的意思是，如果他说出去了，可能对这个作者会有所不利。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锡璋确实不知道，而且他就这样干脆地答复对方了。

以我当时满脑子民主主义和言论自由的思想，我丝毫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错误的地方。而且在这以后，陈锡璋同我再也没有提到过这个问题。然而事后想想，我确实有点后悔，想我写后应当告诉他这件事，好让他有个思想准备。这事情以后如何发展，不得而知，但如果对方再来追问，他该如何答复对方？这岂非给他留下一个难题？这是我感到对不起他的地方，也是叫我产生去留想法的一个原由。

事隔数月，沈宗濂来信了，我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由他送给《上海新闻报》发表，并附来了剪报。记得这天的新闻报是用整版一次登完，标题和副标题是由他们加的，并在文章前面写了一段按语，说作者曾旅藏多年，熟谙藏情，所以文章是如何具体可信之类的话，这才使我恍然为什么西藏地方政府既能肯定作者不出基度巴院内，但还不能肯定究竟是谁的一个理由，然而这已是几个月后的事情。几个月来却一直无声无息，我因之也就不太重视。

大致与此同时，究竟孰先孰后，不一定记得很准确，我又遇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。

1947年印度独立，对此我是有一点个人想法的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印度争取独立的浪潮汹涌而起，尽管丘吉尔在一次会上说过：“我不打算当一名清算英帝国的第一任首相。”然而现在终于成了事实。我非常钦佩甘地、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，认为这是我们亚洲人共同的愿望。我还相信，中印两国推翻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之时，也就是我国西藏地方摆脱英国势力控制之日。

这使我想起1908年4月20日清廷议约专使张荫棠和西藏噶伦擦绒·汪曲结布为一方向英国议约专使韦尔敦为一方向所订的《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》。这个不平等条约的第十三款规定：章程从签字之日起，每届十年，双方可在6个月内提出修改，如不提出，即继续生效十年，以后每届满十年，都照此办理。我想1948年转眼就到，这一条约将满第四个十年，而条约的对方已经不是一个殖民主义的英国，而是一个赶跑殖民主义的印度，这不是一个重订这个条约的最好时机吗？我就照这个意思，写了一个签呈给办事处，办事处也就照此转上去了。

一天，我到办事处去，他们让我看外交部的一个来电，大意是：关于外交问题，外交部自会统筹安排，无需办事处代为提出，并指出我们去电所称英印政府一词应改为印度政府，嗣后应加注意等等，大意如此，具体措词已记不清了。这不啻是一次“体面的”申斥！

究竟是我们去电用了英印政府，所以来电叫我们应改称印度政府，还是我们去电用了印度政府，来电要我们改称英印政府，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，去电时正是英国政府向印度政府转移政权的时候，而按以前的习惯用法，包括英印官方文件在内的英印政府和印度政府两个名词并无区别，是可以交换使用的。

我当时看了电报，愈想愈反感。这使我想起上文提到的在进藏之初，看到那份电报中说的，要以“无事为大事，无功为大功”的指示。我想我写了那篇关于热振事变的文章后，可说已经是多事生非，现在又提出一个应当只属于外交部管的问题，岂非又犯了邀功之嫌？我想算了，还是走罢。这样，我就一面提出辞呈，一面向印度国际大学联系，准备去那里做点研究工作。我对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西亚学会收藏有关西藏的图书之丰富，早有耳闻，这次准备去那里做点个人兴趣所在的研究工作，应当是可以的。还有两点值得一提，一是我早同沈宗濂约定合著一本有关西藏的书，一直没有时间着手，现在正好去印度把它写出来，这就是后来在美国出版的《西藏与西藏人》一书；其次，我相信叶落归根，我迟早是要回内地的。我当年是经印度到西藏的，现在是从印度返回内地，印度可说是我的必经之路。但事情又拖了一段时间，直到一次办事处向蒙藏委员会去电催促速派继任人员时，蒙藏委员会复电说，继任人选虽已内定，一时恐难来藏，但该办事处已经正式提出辞职的人员，不妨可以先走。这样我就决定好行期，束装就道了。

记得临行前，碰到印度办事处的一个熟人。他问我，听说我要离开西藏了，准备几时回来？我说，没有这个打算，因为我辞职了。他听后，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。其实，他是早该知道的，我是几个月前向印度政府提出申请入境居留，准备到国际大学做研究工作并已得到允许的。这一切都是通过他们办的手续，他不可能不知道。他大概只是想试探一下，我是否还有别的情况。

又记得那次办事处替我向噶厦办理乌拉马牌，回信时间也拖得比平时略长一些，是经办事处派人去催促之后才取到的。是否中间也发生了一点故障？

但这些都是事后的想法，而我在当时一点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。一路上我也是按站行走，沿途停留，只是到了江孜后，按照惯例准备发个电报给拉萨办事处，报告一路平安的时候，当地的西藏电报局说是因为线路中断，暂停发报，这在当时的西藏也是常有的事。等到了亚东，我会见当时印度驻亚东商务代理处的主管时，问起通拉萨的电报有无恢复，他说他不知道拉萨有不通电报的事，并马上叫进一个办事员来询问，才得到证实。很可能，他是真的不知道。

次日，我到了锡金首都甘托克，遇到了我们在拉萨熟识的一位王室成员，这才知道拉萨发生了遣送国民党人员一律离境的事情。如果不是在甘托克听到这个消息，也许我要到印度加尔各答后才会知道。对这位王室成员我是非常感激的。

一个月后，我同从拉萨撤出的办事处人员等在噶伦